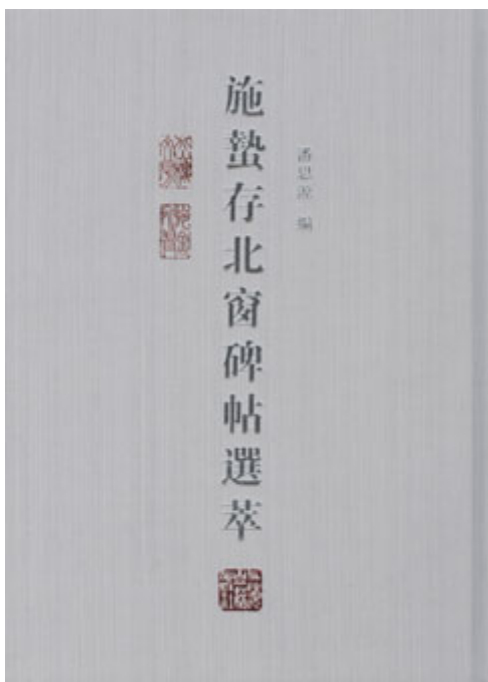


《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前言



余营商之余，尤嗜经史百家，遇所善之书辄购以珍藏之，二十年来所积遂多，逾一万二千余册，考镜源流，斟酌版片，乐于其中，以消永日。戊子年冬，获悉沪上著名文学泰斗施蛰存先生所藏二千余件历代碑帖拓片将被整体拍卖，因其于二〇〇三年辞世后，长期保存在旧居内北山楼的碑帖，面临潮湿、虫蛀，这些老人生前钟爱的宝贝已被侵蚀威胁，为妥善保存这些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不使其遭流散之厄，故其家属与拍卖公司协商整体拍卖，以妥善保存施蛰存先生的碑帖研究之收藏。

蛰存先生曾形象地用“打开四扇窗户”概括其学术研究之四方面，即文学创作为“东窗”，古典文学研究为“南窗”，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为“西窗”，

“北窗”则为其碑版整理与研究。蛰存先生的碑帖研究虽有如《后汉书征碑录》、《三国志征碑录》、《魏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云间碑录》、《北山楼碑录》等专著多部，然为其文名所掩，人多不知。今北山楼藏品告急，令人扼腕心疼。

施蛰存先生北山楼藏品颇多前朝名人手跋钤印珍藏之本，蛰存先生生前对其藏品分门别类加以标注，或题识，或题签，并钤“吴兴施舍所藏”、“施舍金石”、“施舍读碑记”、“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专瓦文”、“无相庵”、“北山楼文房”等印记。余慕蛰存先生文名久矣，睹物思人，益增对其学识人品之仰慕，恨不能起地下与之请益，遂欣然将蛰存先生之北山楼古代碑帖藏品购入余之书斋中，辟专室储之宝之，日夕忻晤，如直面先生之聆教。蛰存先生碑帖之研究，实繫中华学术文脉在焉。兹例举如下。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墨拓、朱拓二件，浙东第一古碑。该碑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五二），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于余姚客星山出土。出土时碑额断缺，石高九十三厘米，宽四十二厘米，存二百十七字。《汉书·高帝纪》云：“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则知三老乃乡县掌教化、秩掌行政之官。《三老碑》系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记先祖之德业及忌日，以晓后代祭祀时可遵以从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咸丰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斃墓，见石上有字，归以告余。余往视，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设祭，移至山馆，建竹亭覆之。”叙出土之事甚详。咸丰十一年辛酉，余姚周世熊得此

碑，民国初转售江苏丹徒陈渭亭，陈氏拟以重金售于日商，时西泠印社社员闻之，不忍其沦于异域，而图永久保存之，集六十余人之力，募银八千圆，向陈氏赎碑运回浙江。“虑其久而复湮也，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慎重度奥建室。”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题云：“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汉三老碑》点画藏头护尾，纵收得体，波磔燕尾徐徐沉稳，笔画纵逸，深古遒厚，介篆隶间，为研究汉字隶变之重要史料。该碑拓片第四列“次子”之“次”末笔未损，右直线完好，应为石面未经磨平之前早期拓本。钤有“周世雄熊印”、“余姚客星山周氏家藏”、“会稽周氏凤皇专斋藏”等印。此石初未传拓，周氏得碑后方拓有百十余纸，此本墨拓当为周世雄得碑后所拓，朱拓本为迁西泠印社后所拓，朱墨两拓可见该碑迁徙古物保护之史。

汉《孟孝琚碑》，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〇）九月出土于云南昭通城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现嵌置于凤池书院（今昭通第三中学）汉碑亭内，被誉为“滇南瑰宝”。碑上端残缺，下端完整，残碑高一三三厘米，宽九六厘米，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残有二十一字，现存二百五十六字，四边花纹为汉代四灵图案，左龙右虎，下龟纹，上缺图案当为朱雀。碑文方笔隶书，结体宽舒方整，用笔方劲峭拔，体势恢宏夸张，布局茂密浑穆，打破了学术界隶书“北方南圆”之陈说，梁启超云：“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碑文记载孟孝琚之生平，借此可窥汉代云南人民与中原文化之关系。孟孝琚“改名为琚，字孝琚”，琚，即琼，《说文》：“琚，琼或从旋省。”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典。碑文云：“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武帝改汉初“闭蜀故徼”之策，重开南夷道，于昭通设朱提县，昭通与汉朝关系日益密切，从碑文中可知当时小孩已把《韩诗》、《孝经》等儒学经典作为必读课本，且碑文有云：“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时人尊崇孔子及其行事，并熟用其典。东汉之际，南中大姓对中原文化之仰慕并深受其熏陶，在此碑文中表露无遗，乃研究汉代云南与中原文化融洽发展的珍贵史料。